

# 敦煌文書中所存赴印或來華僧人行記述要

楊寶玉

中國社會科學院

**摘要：**1900年開啓的敦煌藏經洞中保存有數萬件形成於公元4-11世紀的各類文書，其中數量尚稱可觀的赴印或來華僧人行記對於研究中古時期的佛教傳播史、中印交往史等課題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本文集中揭示相關文書的學術價值、現存狀況、整理與研究現狀等，既涉及傳世文獻中留有傳本的《大唐西域記》、《南海寄歸內法傳》，也包括僅見於敦煌文書的《慧超往五天竺國傳》、《西天路竟》、《聖地遊記》、《印度行記述》(兩種)、《中印度普化大師巡禮五臺山日誌》等。作者期待本文能為感興趣的學者提供資料便利，並吁請同好展開更加深入細緻的挖掘探討，共同推進相關研究向縱深發展。

**關鍵詞：**敦煌文書、僧人行記、中印交通

1900年開啓的敦煌藏經洞中保存有數萬件形成於公元4-11世紀的各類文書，其中赴印或來華僧人行記的數量尚稱可觀，對於中古時期佛教傳播史、中印交往史等方面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本文即擬集中揭示相關文書的學術價值、現存狀況、整理與研究現狀等，以期能為感興趣的學者提供便利，進行更加深入細緻的挖掘探討，共同推進相關研究向縱深發展。至於對相關文書的文獻學整理與分別針對不同問題的專項研究，則將於待刊書稿《敦煌漢文文書中所存中印交往史料整理與研究》<sup>1</sup>中體現。

## 一、赴印僧人行記

敦煌文書中保留的赴印求法僧行記較多，以下略依時間順序分別梳理，無法推斷時間的幾件置後，依現存文字多寡排序。其中前兩種，即《大唐西域記》、《南海寄歸內法傳》又見於傳世文獻；第三種，即《往五天竺國傳》在傳世文獻中有相關記述，但無傳本；後四種則未在傳世文獻中覓得蹤迹，僅存於敦煌文書。

### (一)《大唐西域記》

如所周知，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僧人行記首推《大唐西域記》，該書記述了初唐高僧玄奘（602-664年）歷時十餘年歷經百餘國或地區的赴印求法過程中的所見所聞，內容豐富翔實，為研究古代西域、中亞、南亞等地歷史及中印交往史所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歷來備受推崇與重視。

---

<sup>1</sup> 該書稿由筆者帶領幾位學生共同完成，目前正處於修改潤飾即將付梓階段。該書稿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敦煌中外關係史料的整理與研究”（敦煌研究院楊富學先生主持，項目編號：19ZDA19，已結項）的第一子課題“敦煌與中印交通”（筆者主持）的工作成果。

敦煌文書中保留有至少四件《大唐西域記》寫本，所抄分別為唐初著名史學家敬播為《大唐西域記》所作序言（學界習稱“敬播序”），及該書卷一、卷二、卷三的部分內容，係毫無爭議的該書早期傳本<sup>2</sup>，彌足珍貴。

四件寫本中，英藏敦煌文書 S.958、S.2659V，及法藏敦煌文書 P.3814 揭出較早，不僅曾被輯印成冊<sup>3</sup>，學界刊發的多種《大唐西域記》整理本（如章巽點校《大唐西域記》<sup>4</sup>、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sup>5</sup>、范祥雍《大唐西域記匯校》<sup>6</sup>等）也關注了它們。祇是上述論著均係以《大唐西域記》全書為整理對象，今存文字量比較有限的這三件敦煌文書僅為其偶或提及的參校本。另一件寫本 P.2700bis，則是至 1988 年纔由劉銘恕《敦煌遺書叢識之四·〈大唐西域記〉的第四個殘卷》<sup>7</sup> 揭出。1989 年出版的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sup>8</sup> 專門輯校藏經洞所存地理類文書，所收便包

<sup>2</sup> 學界曾長期公認敦煌本為今存《大唐西域記》的最早傳本，近年有學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例如，柳洪亮《〈大唐西域記〉傳入西域的有關問題》（載馬大正、王嶸、楊鏞主編《西域考察與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99-306 頁；又收入柳洪亮《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372-381 頁）推論 1981 年吐峪溝千佛洞所出 81SAT:1《大唐西域記》卷七“戰主國”條殘片寫於貞觀二十年（646）。再如，〔日〕高田時雄《京都興聖寺現存最早的〈大唐西域記〉抄本》（高啓安譯文載《敦煌研究》2008 年第 2 期，第 47-48 頁）推論日本京都興聖寺所藏《大唐西域記》卷一之另外書寫的題記中的紀年（日本延曆四年，公元 785 年）即是該寫本的抄寫年，進而認為該寫本乃書有確切紀年的《大唐西域記》的最早抄本。

<sup>3</sup>（唐）玄奘撰、辯機編，向達輯《大唐西域記古本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sup>4</sup>（唐）玄奘撰，章巽點校《大唐西域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

<sup>5</sup>（唐）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sup>6</sup> 前揭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的校勘工作係由范祥雍承擔，故 201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范祥雍古籍整理匯刊”時亦出版了略去了注釋部分而保留了校勘內容的《大唐西域記匯校》。

<sup>7</sup> 劉銘恕《敦煌遺書叢識之四》，首先發表於 1988 年在北京召開的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後收入正式出版的該會議論集，即姜亮夫、郭在貽編《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文集》，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 年，第 33-35 頁。

<sup>8</sup> 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89 年。

括了上述四件文書。2021年，筆者與所指導的博士研究生梅雪對 P.2700bis 進行了專門整理與研究<sup>9</sup>。

以下依各文書所存內容在《大唐西域記》中的先後順序逐一梳理。

### 1.P.2700bis 《大唐西域記·敬播序》、《大唐西域記》卷一

法藏敦煌文書 P.2700bis<sup>10</sup> 爲一殘片，存字 13 行，其中前 3 行下部殘缺約三分之一，第 4 行下部 6 字僅存左半部，第 7、8 行上部各殘缺幾個字。該殘片滿行最多書 19 個字（不計雙行小注字數），字迹清晰，多處以雙行小字爲難字注音。

P.2700bis 現存文字雖然不多，但所涉內容卻比較複雜，實包括三個部分：起首至第 2 行的“梯山而奉”的 20 餘字，屬《敬播序》的結尾部分，且爲節抄而非原文；自“阿耆尼國”至第 11 行的“縛喝國”，爲《大唐西域記》卷一目錄中的三十四國國名，各國名的抄寫順序及部分國名用字與傳世本不盡相同；自“歷選聖猷”至“虞舜之納”，爲《大唐西域記》卷一正文的起始部分。

需於此說明的是，前揭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在介紹本卷現存狀況時謂“疑與斯 2659 號爲一卷分割所致”，余欣《〈大唐西域記〉古寫本述略稿》<sup>11</sup>亦疑本卷與 S.2659 “原爲同一寫卷之斷片，割裂分藏兩處所致”。諦審兩件文書，不僅字迹有別，行款差異更大：P.2700bis 的相鄰行緊貼密集，S.2659V 的行間距則相當大；P.2700bis 每行僅書十餘字，S.2659V 各行一

<sup>9</sup> 梅雪、楊寶玉《法藏敦煌文書 P.2700bis〈大唐西域記〉殘片校釋》，《石河子大學學報》2021 年第 5 期，第 105-110 頁。

<sup>10</sup> 文書圖版見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1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301 頁。另外，“國際敦煌項目”網站（網址爲：<http://idp.bl.uk>）已公布該文書彩版。

<sup>11</sup> 余欣《〈大唐西域記〉古寫本述略稿》，《文獻》2010 年第 4 期，第 30-44 頁。

般均在 20-30 字。因而，筆者認為兩者由同卷分割而成的可能性非常小。至於兩號文書的抄寫者、抄寫時間、抄寫目的等是否有關，僅靠目前已知材料恐難形成定論。

## 2.S.2659V 《大唐西域記》卷第一

英藏敦煌文書 S.2659<sup>12</sup> 的正面抄存有摩尼教經典《下部讚一卷》(尾題)、佛教典籍《僧羯磨卷上》，背面所抄為《大唐西域記一卷第一》(尾題)、《往生禮讚文一卷》(首題及尾題)、《十二光禮懺文》(首題)等，後者末行底端書有“往西天傳一卷”6 個字(有學者認為是《大唐西域記》的尾題<sup>13</sup>)，再後又有一個小紙條上寫有“往西天求法沙門智嚴西傳記寫下一卷”等字。“智嚴”一名又見於 S.5981《同光貳年(924) 鄜州開元寺僧智嚴巡禮聖迹後記》(詳後)，是知本卷當抄寫於後唐同光前後。

S.2659V 抄存的《大唐西域記》卷第一這部分文字首殘尾全，今存字 302 行，滿行行約 20-28 字(不計雙行小字)，字迹清晰。起於“而寡略，好自稱伐……”，訖於尾題“大唐西域記一卷第一”，為從阿耨尼國至迦畢試國，即卷一的大部分内容，是敦煌文書中所存《大唐西域記》諸寫本中篇幅最長的一卷。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錄》曾指出本卷是唐末五代抄本<sup>14</sup>。關於 S.2659V 所抄各文書之間的關係，榮新江《敦煌文獻所見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認為“《往西天傳一本》和《西傳記》所指均為第一件之《大唐西域記》，它與其後之《往生禮讚文一卷》

<sup>12</sup> 文書圖版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 4 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58-176 頁，其中《大唐西域記》部分為第 158-170 頁。

<sup>13</sup> 陳祚龍《敦煌學要籥》，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 年，第 120 頁。

<sup>14</sup>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 年，第 132-136 頁。

《十二光禮懺文》為智嚴西行所攜帶的實用文書。<sup>15</sup>除前揭《大唐西域記》諸校本與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等外，郝春文等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13卷<sup>16</sup>亦對本卷進行了釋錄。

### 3.P.3814《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P.3814<sup>17</sup>首殘尾全，今存字173行，滿行行約17-24字（不計雙行小字），起“遠起窳堵波……”，訖尾題“大唐西域記卷第二”。現存文字為卷二後部健馱邏國（今日習稱“犍陀羅”）的絕大部分內容，字迹清晰，有校改痕迹。總體上看，本卷中的訛文誤字較S.2659V所抄《大唐西域記》卷一少一些。

### 4.S.958《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S.958<sup>18</sup>首尾均殘，上下亦多有殘損。今存字16行，其中前3行每行僅書一個國名，為卷三之卷前目錄中的後三國國名，而前五個國名已失，正文部分僅2行字全，其餘11行皆有程度不同的殘失。今存正文部分記述的是烏仗那國事，止於所述第一處聖迹（即忍辱仙遺迹）的末句“割截支體”。該卷現存字迹相當工整清晰。

除前揭《大唐西域記》諸校本與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等外，郝春文、金澄坤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

<sup>15</sup> 榮新江《敦煌文獻所見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原刊《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下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57頁；後又收入氏著《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98-116頁。

<sup>16</sup> 郝春文、金澄坤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4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439-442頁。

<sup>17</sup> 文書圖版見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56-160頁。

<sup>18</sup> 文書圖版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7頁。

第 4 卷<sup>19</sup>亦對本卷進行了釋錄。

附：羽 094V 《唐三藏哭西天行記(讚)》

或當附此一提的是日本杏雨書屋藏羽 094V 《唐三藏哭西天行記(讚)》<sup>20</sup>。

該件文書雙面書寫，正面所抄為《天台智者大師智顛別傳》(擬題)等，背面先抄四威儀(有分段首題“行威儀”“住威儀”“坐威儀”“卧威儀”)，再換行接抄首題為“唐三藏哭西天行記”的一段文字，後接抄《十恨歌》(擬題)。

所謂“唐三藏哭西天行記”部分共 11 行，其中首題獨佔 1 行。全件筆迹一致。考這段文字雖有上錄首題，但內容卻非一般行記，文體也不是行記類作品常用的散文，而是五言韻語。這 11 行文字係以第一人稱唱嘆西行求法之路的艱辛孤苦，緬懷哀悼同行先殞者的不幸，傾訴自己難以抉擇時的彷徨孤寂，最終以爲了信仰克服萬難孤身前行的堅毅決心收篇。《敦煌秘笈》將其題名著錄爲“唐三藏哭西天行記讚”，徑直擬補了一個“讚”字，當是想以此突出對其文體的推斷。《敦煌秘笈》又稱這段文字的原題名爲“唐三藏哭西天行記一卷”，不確，文書中並無“一卷”，不宜擅加。綜合考量該卷，尤其是背面各部分內容與文體屬性，筆者認爲，此段文字並非行記，而當屬讚文。至於文題，諦審《敦煌秘笈》的擬題，在“記”這一有文體特性的字之後補“讚”字，似容易造成混亂，於文法亦不順暢。故筆者考慮將“記”校改爲“讚”。

<sup>19</sup> 郝春文等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 13 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年，第 230-267 頁。

<sup>20</sup> 文書圖版見〔日〕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編《敦煌秘笈》影片冊一，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2009 年，第 552 頁。

因該件原題易使人誤判其為唐三藏赴西天行記，特附記於此，並做如上說明。

今知學界已刊關於本件文書的整理與研究成果較少，主要就是魏迎春、馬振穎《敦煌碑銘讚續編》<sup>21</sup>，該書認為文書篇題中的“西天行記”指的就是玄奘所撰《大唐西域記》。

## (二) P.2001《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一並序》

唐代高僧義淨(635-713年)所著《南海寄歸內法傳》<sup>22</sup>也是非常著名的僧人行記，記述了義淨在印度和南海各地見聞的僧徒日常行事的法式，雖以有關戒律的各節為主要部分，但也連帶述及印度古代哲學派別、當時部派佛教與大乘教團分佈情況、寺院的制度和學風、當時的著名大德與佛教學者、印度的聲明和學習梵語語法的方法，以及一般社會風俗諸方面情況，留下了大量有關古代印度及南海一帶的記述，為研究南亞次大陸歷史、地理和佛教史等提供了極其重要的資料。

藏經洞保留的相關寫卷為法藏敦煌文書 P.2001<sup>23</sup>，該卷首尾俱全，抄存文字總計 354 行，滿行行約 24-37 字(不計小注字數)，字迹清晰，經朱筆校改，有單行或雙行小字注釋。

P.2001 所抄為《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一並序》，抄寫者不詳。關於其抄寫時間，有學者推斷為八世紀前半期<sup>24</sup>，筆者更傾向於

<sup>21</sup> 魏迎春、馬振穎《敦煌碑銘讚續編》(以下簡稱“魏書”)，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91頁。筆者所做錄文與魏書有異，如第9行末字至第10行前4字，魏書錄為“泉路今何往”，筆者則識讀為“界路今何往”，於文意及對該讚文意涵的解讀差異頗大。

<sup>22</sup> 收錄於《大正藏》第五十四冊。

<sup>23</sup> 文書圖版見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13頁。

<sup>24</sup> Jean-Pierre Drège, “Papiers de Dunhuang, Essai d’analyse morphologiq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ates”, *T’oung Pao* Vol. LXVII, 3-5 (1981): 358.

王邦維《敦煌寫本〈南海寄歸內法傳〉(P.2001)題記》<sup>25</sup>所持上限在天授二年(691)的觀點。王先生該文描述了P.2001寫卷的形態，認為該寫本與S.2659V《大唐西域記》“極相類似”。該文還梳理了《南海寄歸內法傳》的版本，認為敦煌本P.2001及日本藏奈良寫本是宋代以前寫本，二者“頗相近”，並舉例指出了P.2001《南海寄歸內法傳》的校勘價值及錯訛。王邦維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再談敦煌寫卷P.2001號：學術史與〈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的書名》<sup>26</sup>指出敦煌本可能是《南海寄歸內法傳》最早的寫本，認為伯希和所藏寫卷編號始於P.2001《南海寄歸內法傳》是與當時歐洲東方學界的學術研究偏好有關。王先生所著《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sup>27</sup>以宋刻《磧砂藏》本為底本，將P.2001、日本天理大學出版的石山寺本、《思溪藏》本、《趙城金藏》本、《高麗藏》本等作為參校本，首次校注整理了《南海寄歸內法傳》。譚代龍《南海寄歸內法傳校箋》<sup>28</sup>和《南海寄歸內法傳解詁》<sup>29</sup>，則以《趙城金藏》本為底本，對《南海寄歸內法傳》進行了詳細的校注。對於卷一部分，上舉兩書都以敦煌本為參校，但偶有遺漏。

### (三) P.3532《往五天竺國傳》

法藏敦煌文書P.3532<sup>30</sup>首尾均殘，上下亦時有殘損，今存開

<sup>25</sup> 王邦維《敦煌寫本〈南海寄歸內法傳〉(P.2001)題記》，《中國文化》創刊號(1989年第1期)，第44-46頁。

<sup>26</sup> 王邦維《再談敦煌寫卷P.2001號：學術史與〈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的書名》，《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第33-39頁。

<sup>27</sup> 王邦維《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該書1995年第一次印刷出版，2000年、2009年兩次重印。

<sup>28</sup> 譚代龍《南海寄歸內法傳校箋》，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

<sup>29</sup> 譚代龍《南海寄歸內法傳解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

<sup>30</sup> 文書圖版見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2-166頁。國際敦煌項目網站(網址：<http://idp.bl.uk>)亦公佈了文書彩色圖版。

頭部分的下部殘損尤甚。現尚存字 227 行，滿行行約 25-36 字，字迹較爲工整清晰，但俗訛字略多，文法亦時有特異獨行之處，故識讀不易。其內容則屬久已失傳的新羅僧人慧超所撰《往五天竺國傳》。

新羅僧慧超（有時亦被寫作“惠超”），傳世史籍中無傳。因唐代高僧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〇〇曾提及慧超著有三卷本《往五天竺國傳》，其人其書遂爲後世所知。但是，《往五天竺國傳》原書五代後既已佚失，傳世文獻中僅《一切經音義》存有該書書名及所釋 85 個詞彙。因而，敦煌文書抄存的雖僅爲不分卷的節略本殘篇，仍然彌足珍貴——它爲後續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

《往五天竺國傳》係慧超入印度朝聖的旅行記錄，記載了印度、西域等地的宗教與風情。據該卷等可知，慧超是自海路赴印度的，於開元十五年（727）回到安西（今庫車）。其時正值大食亦即阿拉伯人崛起、突厥人進佔吐火羅，該行記遂涉及大食對北印度與粟特和吐火羅地區的佔領及其影響、健馱羅（今日習稱“犍陀羅”）和河中地區突厥化的過程等重要問題，對於研究 8 世紀中亞絲綢之路，特別是該地區突厥化和伊斯蘭化發端時期的情形具有極高價值。

關於《往五天竺國傳》的成書時間與成書過程，學界觀點不一。羅振玉認爲“殆在元宗朝”<sup>31</sup>，即唐玄宗時期；陳士強推測可能撰於開元十六年（728）<sup>32</sup>；朱蘊秋、申美蘭認爲這本書稿是慧超在開元十六年回到長安後的五六年時間裏整理而成<sup>33</sup>；林基中則

<sup>31</sup> 羅振玉《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及校錄割記》，收載於《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六），臺北：大通書局有限公司，1989 年，第 2101 頁。

<sup>32</sup> 陳士強《新羅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一卷》，氏著《大藏經總目提要文史藏二》地志部第一門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433 頁。

<sup>33</sup> 朱蘊秋、申美蘭《〈往五天竺國傳〉中的印度人形象》，《瀋陽大學學報》2005 年第 3 期，第 91 頁。

主張是在旅行途中成書<sup>34</sup>。

關於敦煌本《往五天竺國傳》的特性，羅振玉在將慧琳《一切經音義》所引內容與敦煌寫卷比對的基礎上，認為 P.3532 是刪節本而非完本<sup>35</sup>；高田時雄從語言學角度考察了《往五天竺國傳》的介詞、量詞、被動結構等，也將《一切經音義》所引內容特別是詞語與敦煌寫卷進行對照，認為該卷不是定稿本，而是草稿本<sup>36</sup>。

《往五天竺國傳》殘卷再現百餘年來，學界刊發的整理與研究成果相當多<sup>37</sup>。文獻學整理方面，從最初的過錄，到越來越詳盡的校錄、注釋、解說等，力度不斷加大，為深入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文獻基礎。羅振玉<sup>38</sup>、鄭炳林<sup>39</sup>、王仲犛<sup>40</sup>、楊建新<sup>41</sup>，及日本學者羽田亨<sup>42</sup>、玄幸子<sup>43</sup>等，皆對該卷的整理做出了重要貢獻，而張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sup>44</sup>、〔日〕藤田豐八《慧超往五天竺

<sup>34</sup>〔韓〕林基中著，文英譯《關於〈大唐西域記〉和〈往五天竺國傳〉的文學特性》，《韓國學論文集》1994年第2輯，第152頁。

<sup>35</sup>羅振玉《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六），臺北：大通書局有限公司，1989年，第2101頁。

<sup>36</sup>〔日〕高田時雄《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之語言與敦煌寫本之性質》，高田時雄著，鍾獅等譯《敦煌·民族·語言》，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359-385頁。

<sup>37</sup>詳參楊寶玉、楊曉梅《敦煌本新羅僧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史述要》，武威市涼州文化研究院編《涼州文化研究論輯》，蘭州：讀者出版社，2024年，第298-307頁。

<sup>38</sup>羅振玉《敦煌石室遺書》第四種《五天竺國記》，包括《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錄文和《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校錄札記》兩部分，1910年1-2月誦芬室刊印，又收載於《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六），臺北：大通書局有限公司，1989年。

<sup>39</sup>鄭炳林《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氏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01-224頁。

<sup>40</sup>王仲犛《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考釋》，王仲犛著，鄭宜秀整理《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15-307頁。

<sup>41</sup>楊建新《往五天竺國傳》（節錄），《古西行記選注》，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7-119頁。

<sup>42</sup>〔日〕羽田亨《慧超往五天竺國傳逐錄》，《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史學論文集別冊》，京都：1941年。

<sup>43</sup>〔日〕玄幸子《關於〈往五天竺國傳〉裏面出現的語言特徵》，《漢語史學報》2017年第2期，第118-131頁。

<sup>44</sup>張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初版，2000年修訂再版。

國傳箋釋》<sup>45</sup>、〔日〕桑山正進《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sup>46</sup> 尤其被相關學者認可重視和長期引用。

#### (四) S.383 《西天路竟》

英藏敦煌文書 S.383<sup>47</sup> 首尾俱全，一紙。正面抄爲 19 行，滿行行 18-22 字，字迹清晰，偶有重文符號及因上下字顛倒而旁注倒乙符號者，首題“西天路竟一本”，無尾題。卷背唯有當初幫助斯坦因簡單清理文書的蔣孝琬所書“東京至西天路程”及其用朱筆標記的蘇州碼子。

這是一件記錄中印交通路綫的重要文獻，文題之下僅以“東京至靈州四千里地”一語概言旅人比較熟悉的東京至靈州里程，然後即轉入正文，詳記自靈州出發赴南天竺寶陁洛山途中歷經各要地所需時日、里程等。

關於本件的作者、撰作時間，學界流傳較廣的是黃盛璋先生所持“爲北宋乾德四年（966 年）詔遣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西域求法中之一沙門行記，與同次赴印之《繼業行程》、及《宋史》、《佛祖統記》所記行勤等路程皆合”<sup>48</sup> 的觀點。也有不同意見，如：錢伯泉先生即推論《西天路竟》寫於五代後唐時期而非宋初，“是唐

<sup>45</sup> 〔日〕藤田豐八《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漢文本，北京排印，1910 年；訂正再版之日文本，東京，1911 年；錢稻孫中譯本，北平，1931 年。

<sup>46</sup> 〔日〕桑山正進編《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2 年。

<sup>47</sup> 文書圖版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 1 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70 頁。

<sup>48</sup> 黃盛璋《〈西天路竟〉箋證》，《敦煌學輯刊》1984 年第 2 期，第 1 頁。黃先生所用的這段史料，見於《宋史》卷四九二《吐蕃》等，如《宋會要輯稿·蕃夷四》天竺國條即記作：“（乾德）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詣闕，上言願至西域求佛書。許之。以其所歷甘、沙、伊、肅等州，焉耆、于闐、割祿等國，又歷布路沙、加濕彌羅等國，並詔諭令人引導之。”

朝後期至五代的第一部西域行記，也是行程最長的一部中西交通實錄”<sup>49</sup>；劉銘恕先生則比對以《宋史·天竺國傳》，認為“《西天路竟》的行程，應該是在行勤之前曾到過天竺巡禮的滄州僧人道圓的西行路綫。道圓於宋太祖乾德三年回到東京後，即被宋太祖召見，召問所歷風俗、山川、道里，一一能記。其口述被記錄下來，自然存檔……行勤特踏道圓之足迹，步前人之後塵，非《西天路竟》原作之人。”<sup>50</sup>

曾有多位學者過錄該卷，依發表時間先後，主要有：陳祚龍《新校重訂敦煌古抄〈西天路鏡〉》<sup>51</sup>、黃盛璋《〈西天路竟〉箋證》<sup>52</sup>、唐耕耦與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錄》第1輯之《（一）地志和瓜沙兩州大事記及巡行記·十四 西天路境一本》<sup>53</sup>、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西天路竟》<sup>54</sup>、王仲犖《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西天路竟〉箋釋》<sup>55</sup>、錢伯泉《〈西天路竟〉東段釋地及研究》<sup>56</sup>、郝春文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西天路竟一本》<sup>57</sup>等。其中黃盛璋、鄭炳林、王仲犖、錢伯泉諸位先生

<sup>49</sup> 錢伯泉《〈西天路竟〉東段釋地及研究》，《西域研究》2003年第1期，第16頁。

<sup>50</sup> 劉銘恕《〈西天路竟〉中的“月氏”問題》，劉長文編《劉銘恕考古文集》上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57頁。

<sup>51</sup> 陳祚龍《新校重訂敦煌古抄〈西天路鏡〉》，《南洋佛教》第152期，新加坡伽陀精舍編印，1981年，又收入氏著《敦煌學園零拾》，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1-3頁。

<sup>52</sup> 黃盛璋《〈西天路竟〉箋證》，《敦煌學輯刊》1984年第2期，第1-13頁。

<sup>53</sup> 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錄》第1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78頁。

<sup>54</sup> 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25-229頁。

<sup>55</sup> 王仲犖著，鄭宜秀整理《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08-316頁。

<sup>56</sup> 錢伯泉《〈西天路竟〉東段釋地及研究》，《西域研究》2003年第1期，第16-25頁。

<sup>57</sup> 郝春文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2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232-234頁。

每每對本卷所記地名、各地之間的里程等進行考證比對，創獲頗多。

### (五) Ф.209《聖地遊記述》

俄藏敦煌文書 Ф.209<sup>58</sup> 首部殘，尾部未抄完，今存字 46 行，其中首行僅殘存 2 個字的少量筆劃，尚無法據之推斷究為何字，故嚴格說來現存可識別字共 45 行，滿行行約 14-17 字。

該卷記述了一位僧人巡禮舍衛國、亭場明國、阿育王本生國、天竺國、迦毗舍國、師子國等地佛教聖迹的具體行程。從其所記時間來看，歷時至少有 64 個月<sup>59</sup>，長達 5 年多。今學界為該卷擬名《聖地遊記述》。

鄭炳林先生等認為該文書所抄當屬義淨《西方記》的內容<sup>60</sup>，並對該殘卷進行了校錄，亦討論了文書中記錄的地名。陳明《俄藏敦煌文獻〈聖地遊記述〉研究》<sup>61</sup>也對該殘卷進行了相當深入的探討。

### (六) Дх.00234《聖地遊記述》

俄藏敦煌文書 Дх.00234<sup>62</sup> 為一殘片，今存字僅 8 殘行中的上

<sup>58</sup> 文書圖版見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第 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莫斯科：俄羅斯科學出版社，1993 年，第 241-242 頁。

<sup>59</sup> 鄭炳林先生等計為 58 個月。詳參鄭炳林、徐曉麗《俄藏義淨〈西方記〉殘卷研究》，滿果法師主編《普門學報》第 10 期，臺北：普門學報社，2002 年，第 89-120 頁；鄭炳林《俄藏敦煌寫本唐義淨和尚〈西方記〉殘卷研究》，《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6 期，第 14-18 頁。

<sup>60</sup> 詳參前揭鄭炳林與徐曉麗《俄藏義淨〈西方記〉殘卷研究》、鄭炳林《俄藏敦煌寫本唐義淨和尚〈西方記〉殘卷研究》。

<sup>61</sup> 陳明《俄藏敦煌文獻〈聖地遊記述〉研究》，《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 5 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 350-375 頁。

<sup>62</sup> 文書圖版見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

半行，其中首行僅一兩字可識讀，末行僅存部分筆劃，無從推斷原為何字，故嚴格說來，現存僅為 7 殘行中的上半行的部分文字。

該殘片記述了阿育王塔及其周邊的佛教聖迹，今學界亦為該卷擬名《聖地遊記述》。

今知最早為該卷擬名的是〔蘇〕孟列夫《俄藏敦煌漢文寫卷叙錄》<sup>63</sup>。2005 年學界刊發了兩篇專門研究該卷的重要文章：陳明《俄藏敦煌文獻〈聖地遊記述〉研究》<sup>64</sup>、鄭炳林與魏迎春《俄藏敦煌寫本王玄策〈中天竺國行記〉殘卷考釋》<sup>65</sup>，後者認為 Dx.00234《聖地遊記述》是王玄策撰寫的《中天竺國行記》的殘卷。十餘年後發表的顏世明《許敬宗〈西域圖志〉研究拾零——兼議道世〈法苑珠林〉的成書時間》<sup>66</sup>則認為 Dx.00234 有可能是《西域圖志》的殘卷。不久前武紹衛發表《敦煌本〈聖地遊記述〉再研究》<sup>67</sup>一文，認為此寫本絕非《中天竺國行記》，而是 5 世紀中後葉的作品，很可能是為當時西行求法之人準備的簡明指南手冊。

---

文學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第 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莫斯科：俄羅斯科學出版社，1993 年，第 148 頁。

<sup>63</sup> 〔蘇〕孟列夫主編，袁席箴、陳華平譯《俄藏敦煌漢文寫卷叙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上冊，第 575 頁。

<sup>64</sup> 前揭陳明《俄藏敦煌文獻〈聖地遊記述〉研究》。

<sup>65</sup> 鄭炳林、魏迎春《俄藏敦煌寫本王玄策〈中天竺國行記〉殘卷考釋》，《敦煌學輯刊》2005 年第 2 期，第 3-11 頁，又收載於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編《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新探索與新動向：慶賀朱士光教授七十華秩暨榮休論文集》（《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叢書》004），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年，第 31-39 頁。

<sup>66</sup> 顏世明《許敬宗〈西域圖志〉研究拾零——兼議道世〈法苑珠林〉的成書時間》，《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7 年第 2 期，第 59-72 頁。

<sup>67</sup> 武紹衛《敦煌本〈聖地遊記述〉再研究》，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人文東亞研究中心、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東亞宗教》編輯部聯合主辦、齊魯師範學院中國鄉村調查研究中心協辦的“田野、歷史與東亞社會”學術研討會暨人文東亞研究工作坊第 18 期論文，濟南，2024 年 3 月。

### (七) P.3926 《印度行記》

法藏敦煌文書 P.3926<sup>68</sup> 僅書字 3 行，筆迹相同，當出自同一人之手。其中第 2 行所書“妙法蓮華經卷第七。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城。耆”與前後文字無直接關聯，第 1、第 3 行所書纔是我們的關注對象，所存文字分別為：“更西行三百里，至迦濕彌羅國。”“更西行三百里，至東印度。”故今學界為之擬名《印度行記》。

本件文書內容簡略，少有學者論及。

### 附：S.5981 《同光貳年(924)鄜州開元寺僧智嚴巡禮聖迹後記》

英藏敦煌文書 S.5981<sup>69</sup> 包括 2 個殘片，《同光貳年(924)鄜州開元寺僧智嚴巡禮聖迹後記》所屬殘片首全尾殘，今存字 20 行，其中前 8 行為智嚴記述，第 9-20 行為釋迦牟尼佛主要事迹的簡要介紹，文中對一些時間節點的表述與某些傳世佛籍有異，但在敦煌地區流傳頗廣。該卷有界行，字迹較為工整清晰。編入 S.5981 的另一殘片抄存了《付法藏傳》的部分內容。

本件係來自鄜州的赴印求法僧智嚴途經敦煌巡禮佛教聖迹莫高窟後留下的記述，內容與一般行記不同，而是以發願為主（既為當時的皇帝後唐莊宗李存勗和當時的歸義軍節度使曹議金及敦煌官員百姓祈福，又為自己許願，稱若能求法成功，回到中國後將前往五臺山焚燒肉身供養文殊菩薩，以酬謝菩薩護衛之恩）。因該卷首行及第 2 行上部書“大唐同光貳年三月九日時來巡禮聖

<sup>68</sup> 文書圖版見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3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204 頁。

<sup>69</sup> 文書圖版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 10 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1-12 頁。

迹故留後記”，而研究者常據之為文書擬題，故附介於此。

文書作者自述係“鄜州開元寺觀音院主臨壇持律大德智嚴”，是知智嚴的僧籍隸屬於鄜州（今陝西富縣）開元寺。關於該赴印求法僧，敦煌文書中還有其他一些記錄：例如，上海博物館藏48(28)抄存有一篇首尾完整的《十二時普勸四衆依教修行》，後有題記“時當同光二載三月廿三日，東方漢國鄜州觀音院僧智嚴，俗姓張氏，往西天求法，行至沙州，依龍光（興）寺憩歇一兩月說法，將此《十二時》來留教衆，後歸西天去，展（輾）轉寫取流傳者也。”<sup>70</sup>可知智嚴法師俗姓張，初抵沙州的時間應在同光二年一、二月之際，然後在敦煌官寺龍興寺依止並講法一兩個月，其從內地帶來的佛教著述等深受與中原交通長期不暢的敦煌信衆喜愛。再如，P.2054卷的包首上書有“智嚴大師十二時一卷”<sup>71</sup>，正文即抄《十二時普勸四衆依教修行》（首題），文末題：“同光貳年甲申歲蕤賓之月冀凋二葉，學子薛安俊書。信心弟子李吉順專持念誦勸善。”可知該卷抄寫於同光二年五月，所據底本亦是智嚴攜來。又如，上文提到過的抄寫有《大唐西域記一卷第一》的S.2659長卷卷背之末書有“往西天傳一卷”，再後又書“往西天求法沙門智嚴西傳記寫下一卷”<sup>72</sup>，可知智嚴西行時隨身攜帶著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蓋將其用為旅行指南，敦煌人因此得以抄留。另外，S.4793正面抄存菩提流志譯《大寶積經》卷一〇一《功德寶華敷菩薩會第三十四》，卷背書“時當同光二載三月廿三日，東漢國鄜

<sup>70</sup>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館合編《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第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9-40頁。

<sup>71</sup>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32頁，下引文見同書第338頁。

<sup>72</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4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5、176頁。

州觀音”<sup>73</sup>，據時間、地名、寺名等推斷，亦當與智嚴有關。據前引上海博物館藏 48(28) 題記可知，智嚴後來確實從敦煌再出發繼續西行了，惜受現存史料所限，我們已難知後續詳情。

關於本件的撰作時間，文中明確記為“大唐同光貳年三月九日”，其中的“大唐”無疑是指沙陀人李存勖所建後唐，同光二年時當公元 924 年。本卷為“同光”年號在敦煌文書中的最早用例，參酌以當時敦煌史事，可推知很可能是智嚴最先將該年號傳到了敦煌。

以往曾有多位學者過錄研究本件<sup>74</sup>，識讀結果並無實質性差異，筆者另文<sup>75</sup>進行過集中梳理，限於篇幅，此處不再一一說明。

## 二、來華僧人行記

關於來華僧人行記，今知主要就是法藏敦煌文書 P.3931 抄存的《中印度普化大師巡禮五臺山日誌》。

法藏敦煌文書 P.3931 為冊頁裝，今存 18 葉，兩面書寫，故今存文字頁共 36 頁。除末三頁外，各頁均畫有界行，一般每頁抄字 9 行（個別頁 10 行，末三頁每頁抄 6 行），滿行每行抄 16-18 字。原件墨書，除末三頁外，均有朱筆句讀，亦時有朱筆校改文字書寫於行右，偶有第二次用墨筆所加與原寫本內容無關的詞句。本

<sup>73</sup> 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 38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 年，第 16 頁。

<sup>74</sup> 今知從中印文化交流史角度進行研究的主要有：〔日〕牧田諦亮《智嚴の巡禮聖迹故留後記について》（《大正大學研究紀要》61 號，1975 年，第 55-63 頁）、劉銘恕《敦煌遺書雜記四篇·敦煌遺書中所見的取經人物》（收入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敦煌學論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45-67 頁）、前揭榮新江《敦煌文獻所見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楊寶玉《後唐時期途經敦煌的赴印求法僧及相關史事》（《敦煌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22-26 頁）等。

<sup>75</sup> 楊寶玉《後唐時期途經敦煌的赴印求法僧及相關史事》（前揭）。

件《日誌》抄寫於該卷第 18-52 行，而該卷第 8-17、232-239 行則各抄一件《僧牒》，均有朱筆自題，前件有言“法師者，中印度之人也，利名如來賢”、“言旋震域，誓謁清涼”，後件謂“攜囊鷲嶺，早聞吼石之能……悲心普化，志存游方。遂乃遠別中天，來經上國，翻傳妙典，譯布靈筌”、“今則誓遊震旦，願睹文殊”，以大量詞句讚頌了中印度高僧佛學修養之深和克服險阻東來弘法之不易，並說明了主人公此行的目的地都是文殊道場五臺山。綜合考量 P.3931 全卷內容，筆者認為，這兩件《僧牒》均為靈武節度使或信奉佛教的西北少數部族首領為東行參拜五臺山的異國高僧開具的介紹性信函，兩件《僧牒》中提到的僧人或許有關，甚或不能完全排除為同一人的可能性，從行文語氣推測，兩件牒文的作者或授牒對象可能不同，內容亦不盡相同。至於兩件《僧牒》與《日誌》的關係，目前筆者尚無定見，但不排除其為同組文書的可能性。

《日誌》詳細記錄了普化大師從遙遠印度歷經千辛萬苦參訪五臺山禮敬文殊菩薩的具體行程。以前學界對敦煌文書中保存的僧人前往五臺山途中寫下的行記關注較多，如《往五臺山行記》(敦煌文書 P.4648、S.397 所抄)等即是，而 P.3931《日誌》所記則是佛僧於五臺山內巡遊的詳盡記錄，其巡禮路線、所見聖迹、參拜對象等都值得仔細分析，同時本卷所揭示的西來梵僧對五臺山的虔誠朝拜也頗耐人尋味，它表明其時我國的佛教聖地聖迹在佛教發源地已享有崇高地位。

早在 1990 年，李正宇《印度普化大師五臺山巡禮記》<sup>76</sup>即比對以《古清涼傳》《廣清涼傳》《續清涼傳》以及《五臺山誌》等

<sup>76</sup> 李正宇《印度普化大師五臺山巡禮記》，《五臺山研究》1990 年第 1 期，第 32-33 頁。

傳世文獻，指出這件行記所言中印度佛僧囉麼室利禰縛在五臺山看到的五種神異都是上述各書所未載的掌故，從而揭示了這件敦煌文書獨特的史料價值與可供旅遊開發的現實用途。李先生還圍繞這位梵僧考證相關史事，指出《巡禮記》中的“吉祥天”和“三藏普化大師”是同一人，他於玄奘、佛陀波利和無垢藏之後巡禮五臺山，無垢藏所“幸遇”的“莊皇”大約是指後唐莊宗，而吉祥天巡禮五臺山之事又當在後唐莊宗之後，其游五臺山以及作者撰寫此記皆在後唐之世，可能是後唐明宗、閔帝和末帝三朝十一年間(926-936年)的事。再聯想到《舊五代史·後晉高祖紀》天福二年(937)正月丙寅條所記“西天中印土摩竭陀舍衛國大菩提寺三藏阿闍黎沙門室利縛羅，宜賜號弘梵大師”，李先生推測“後晉詔書中的室利縛羅可能就是巡禮記中的囉麼室利禰縛，譯音繁簡有所不同罷了”，並由此進一步指出，“這位天竺僧人在後晉天福二年初還來到後晉京城洛陽，朝見登上天子之位不到兩個月的石敬瑭，理所當然的受到新朝天子的歡迎。所以石敬瑭特意下詔賜給‘弘梵大師’的稱號。”<sup>77</sup>

筆者認為，普化大師與弘梵大師是同一人的可能性非常大<sup>78</sup>，或許他在後唐時被尊稱為普化大師，到十餘年後的後晉時方被賜號“弘梵”。若是，據《高麗史》所記“二十一年(938)春三月，西天竺僧弘梵大師啞哩嚩日羅來，本摩竭陀國大法輪菩提寺沙門也。王大備兩街威儀法駕迎之”<sup>79</sup>，可知這位大師乃是於926-

<sup>77</sup> 前揭李正宇《印度普化大師五臺山巡禮記》，第33頁。另外，此段引文中的“塘”係“塘”之訛，蓋期刊排版之誤。

<sup>78</sup> 韓國學者李龍範《胡僧襍囉的高麗往復》(韓國《歷史學報》75-76合輯，1977年，第319-337頁)亦認為弘梵大師與胡僧襍囉是同一人。

<sup>79</sup> [朝鮮]鄭麟趾等著，孫曉主編《高麗史》(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1冊，世家卷第二太祖二，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1-42頁。

933 年之間巡禮五臺山，937 年春正月獲得後晉高祖賜號，938 年春三月又到高麗，其在佛教史與中外交往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於此，《資治通鑑》卷二八五開運二年（945）冬十月條的相關記載亦應注意<sup>80</sup>。

關於 P.3931《日誌》的寫作時間，前揭榮新江《敦煌文獻所見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據該卷雜寫文字“判斷普化大師的東來，不晚於天福三年（938）七月。從同卷所寫表狀類資料看，不會早於後唐同光年間（923-925）”。筆者認為還可以做更準確的考證，因為文中“前無垢藏幸遇莊皇，此吉祥天喜逢今聖”一語可以為我們推斷撰作時間提供重要信息，參酌以《宋本冊府元龜》卷一七四《帝王部·修廢》、同書卷九五三《總錄部·傷感》、《太平廣記》卷一五八《李甲》等均以“莊皇”稱莊宗，是知本件《日誌》中的“莊皇”指後唐莊宗李存勳無疑。那麼結合該卷整體情況及後唐諸帝即位情形可知，文中與“莊皇”對言的“今聖”自然是指後唐明宗李亶，故本件當作於明宗朝。

以前曾有數位學者校錄過此文，主要有：陳祚龍《敦煌學林劄記》<sup>81</sup>、唐耕耦與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錄》第 5 輯<sup>82</sup>、杜斗城《敦煌五臺山文獻校錄研究·附錄》<sup>83</sup>、榮新江《敦煌文獻所見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sup>84</sup>、趙和平《敦煌表

<sup>80</sup> 詳參拙文《後唐時巡禮五臺山之中印度高僧普化大師事迹索隱》，待刊。

<sup>81</sup> 陳祚龍《敦煌學林劄記》上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7 年，第 91-95 頁。該部分的法譯及研究有 R. Schneider, “Un moine indien au Wou-t'ai chan”, *Cahiers d'Extrême-Asie* 3 (1987): 27-39.

<sup>82</sup> 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錄》第 5 輯，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 年，第 333-335 頁。

<sup>83</sup> 杜斗城《敦煌五臺山文獻校錄研究·附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21-222 頁。

<sup>84</sup> 前揭榮新江《敦煌文獻所見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下冊，第 962-963 頁。

狀箋啓書儀輯校》<sup>85</sup>、楊寶玉《敦煌文書與五代時期五臺山佛教史研究——以 P.3931 爲例》<sup>86</sup>等，其中後三者相對晚出而錄文更加精準。

### 三、結語

敦煌是古代中西交通的咽喉要地，既是東行僧侶、使節、商人趨入中原的最初落腳點，也往往是西去旅人告別故國的地方。季羨林先生曾指出：“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祇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祇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作為來自東西方的不同文化的彙聚、碰撞、交融之地，敦煌在接受、傳播東西文化方面無疑起到了巨大作用，而多元文化在敦煌匯流，也促成了具有濃郁中國文化特色的敦煌文明的凝聚。

古時僧侶在文化交流中發揮著無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敦煌文獻中保留的求法巡禮僧史料正可爲我們研究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提供資料保障，上文所述即是其中相當重要的部分，內中的部分資料雖已有學者進行過探討，但多爲分別進行的個案式專題研究，而集中全面的系統性研究尚有待我們大家的共同努力。

---

<sup>85</sup> 趙和平《敦煌表狀箋啓書儀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8-231、244-245頁。

<sup>86</sup> 楊寶玉《敦煌文書與五代時期五臺山佛教史研究——以 P.3931 爲例》，高臺縣委編《高臺魏晉墓與河西歷史文化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68-183頁。